

朝鲜王朝的宫廷瓷器

——以王室瓷器为中心

[韩] 金英媛

内容提要 从朝鲜王朝初期起,瓷器就是一种重要的贡物,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瓷器所、陶器所将其作为地方土产贡纳给宫里。贡纳的代表性王室瓷器有粉青砂器和白瓷,其中白瓷尤为珍贵,从朝鲜建国到世宗年间一直是王专用的御器。分院官窑出现后,朝鲜王朝的窑业从初期瓷器所、陶器所的生产体制过渡到前期的分院官窑体制。朝鲜王朝的瓷器发展共分为初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末期五个阶段,不同时期的生产机制和产品具有不同的特点,窑址分布也有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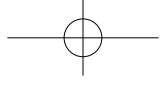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关键词 朝鲜王朝 瓷器所和陶器所 分院官窑 王室瓷器

序言：朝鲜王朝的瓷器

朝鲜时期,瓷器的使用非常普遍,从王室的各种典礼、宫廷生活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瓷器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朝鲜时期代表性的瓷器有白瓷、粉青砂器、青瓷和黑釉等。白瓷的生产和使用贯穿朝鲜王朝的始终。从朝鲜初期一直到世宗年间(1418—1450),白瓷的使用范围只限于王和王妃,是最高级的瓷器,由于需求量的增加,白瓷被大量制作后进贡到宫中。世祖(1455—1468)以后,白瓷便成为整个王室甚至是地方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分院官窑出现后,瓷器制作进入了白瓷时代。朝鲜时期的另一代表性瓷器为粉青砂器,从高丽王朝末期(14世纪后期)到16世纪中叶都有粉青砂器的生产制作,在朝鲜初期,粉青砂器曾是王室的专用瓷器。至于青瓷,据《光海君日记》(1608—1623)时期,王世子所使用的瓷器中有青瓷^①,由此看来,青瓷的生产制作一直延续到16世纪前期。此外还有一种瓷器为黑釉瓷,目前尚无法找到其被用作王室瓷器的记录,因此推断黑釉瓷器虽然被进贡到宫中,但很可能被用作酱类容器,而不是作为餐具使用。

根据朝鲜王朝瓷器的样式特点以及各种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将其发展阶段划分为朝鲜初期(1392—1468)、前期(1468—1592)、中期(1592—1751)、后期(1752—1883)以及末期(1883—

① 《光海君日记》卷一〇二“光海君八年四月壬戌”：“至于司饔院砂器，大殿则用白瓷器，东宫则用青瓷器。”



1910)。在这五个时期中，初期的瓷器生产主要是由瓷器所和陶器所来进行，中央政府派遣官员到各瓷器所和陶器所监督瓷器的生产制作，以保证能将优质的瓷器进贡到宫中。而前期、中期、后期则由分院官窑负责宫廷瓷器的制作，分院自世祖(1455至1468在位)末期开始成立，是负责管理宫廷瓷器机构的机构，分院官窑的代表性产品便是王室专用的白瓷。

下文将对瓷器所和陶器所和分院官窑这两种生产体制下瓷器种类和样式特点的变化，以及代表性的王室专用瓷器进行介绍，王室瓷器不仅包括王与王妃、王世子和王室宗亲所用的瓷器，还包括与王室有密切关系的官僚们所使用的白瓷，因为王室白瓷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传到他们手中。

一 朝鲜王室瓷器的生产体制

(一) 瓷器所和陶器所的成立及发展

朝鲜时期瓷器使用范围之所以有所扩大，是因为受到了高丽后期政治社会急剧变化的影响。高丽时代后期，武人和亲元势力掌握了政权，他们生活奢侈，效仿王室使用青瓷，所以青瓷的需求量剧增，生产量也随之而加大。此外，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末恭愍王、禑王时期，倭寇频繁入侵朝鲜半岛，海岸地区因此而遭受严重损失，局势动乱不已，于是原本在海岸地区从事青瓷制作的工匠们大举迁往内陆地区避难。因此，从高丽末期开始，瓷器的主要生产地慢慢由海岸地区转变成内陆地区，到了朝鲜时期，瓷器窑址分布地扩大到了全国范围，从海岸到山间均有窑场分布。而朝鲜政权建立后，随着瓷器需求量的增加，窑的数量也有所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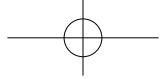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朝鲜初期世宗年间(1418—1450年在位)曾对全国瓷窑进行过调查，我们可通过以下资料来了解当时瓷窑的情况。瓷器是朝鲜时期的重要税源之一，因此瓷窑的调查也是必不可缺的，同时朝廷还制定了租税法，规定瓷器必须要进贡，将瓷器进贡给国家这种制度在高丽王朝初期的光宗年间(949—975)就已经有明文规定，《高丽史节要》“恭让王元年十二月”就记载到，司饗房每年派人前往各道监督制造内用瓷器，且一年进贡一次^①，由此可见，高丽时期的王室专用瓷器是由各地方窑在“司饗”的监督下完成制作后作为贡物上交给宫中的。这种始于高丽末期的由司饗房监管陶瓷生产制作和进贡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朝鲜时期。

朝鲜政权建立后的太祖元年(1392)，朝廷制定了贡纳制，并将其常规化。为了增加租税收入，太祖调整了贡纳品的数量，规定了各地区的贡品，从而巩固了贡纳制度^②，瓷器也因此而成了固定的贡纳品，成为国家的重要税源之一^③。在朝鲜王朝的相关记录中，最初提到贡纳瓷器的资料

① 《高丽史节要》卷三四“恭让王一年己巳十二月壬寅”。

② 《太祖实录》卷二“太祖元年十月庚申”；[韩]金镇凤：《贡纳制的解弛》，《韩国史·12》，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

③ 《庆尚道地理志》“庆州道庆州府条”；[韩]郑杜熙：《朝鲜初期地理志编纂(I)》，《历史学报》69，页66—83，历史学会，1976年。



为太宗十七年(1417) 四月的记录,称“外贡砂木器,以司饗房纳施行”,这里的“外贡砂器”指的便是各地方瓷窑生产后进贡的瓷器^{〔1〕},由此可见,官府和宫中所使用的陶瓷是由司饗房监督进贡的,而且朝廷对此有明文规定以确保其顺利进行。

因此,瓷器可以说是世宗年间的重要贡物之一,由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的瓷器所和陶器所负责生产制作后作为土产进贡给宫里。对于其制作地,《世宗实录·地理志》中有详细的介绍——该书是目前介绍瓷器所和陶器所的最详细资料。此外,世宗年间瓷器的税制改革对增加国库收入和发展对外交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世宗实录·地理志》出版于朝鲜王朝端宗二年(1454),这本书将全国的瓷窑分为瓷器所和陶器所两类进行介绍,书中收录的瓷器所139个,陶器所185个,两类加起来一共有324个。同时,该书还对全国瓷窑的位置以及瓷器的品质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将瓷器的品质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个等级,并对此加以详细说明。因此,《世宗实录·地理志》中收录的瓷器所和陶器所的资料至今仍是窑址发掘和调查的核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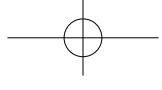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世宗实录·地理志》中仅将高灵(1处)、尚州(2处)和京畿道广州(1处)这4处列为上品瓷器所,我们可以推断这些瓷器所都是制作王室专用白瓷的州窑,例如京畿道广州距离首都汉阳较近,可以随时制作上品白瓷进贡,这在相关文献资料中也得到了确认,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王室白瓷的制作和进贡情况,另外庆尚道地区的三处均为制作最上品王室白瓷的窑址,这里烧制的白瓷也进贡到宫中。根据考古发掘和地表调查资料可知,实际上除了上品瓷器所外,其他瓷器所和陶器所也生产白瓷和粉青砂器并贡纳给王室。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王室瓷器是最上品瓷器,主要由上品瓷器所进行生产后定期贡纳,而其他瓷器所和陶器所也制作王室瓷器并不定期地进贡。由此可以说,朝鲜前期的窑业是以瓷器所和陶器所生产体制为中心的。

（二）分院官窑的成立及发展

朝鲜王朝时期,朝廷设立了专门负责王室瓷器制作的正式机关,名为“分院”,因此,人们便将“分院白瓷”看作是王室白瓷的代名词,分院官窑位于京畿道广州,距离朝鲜时期首都汉阳较近,分院生产出白瓷后,可通过汉江将瓷器运送到宫廷,运输方便,这可能是将分院官窑设在广州的重要原因。高丽王朝时期,王室瓷器要远距离运送,在运输途中瓷器常常遭到损坏或遗失,这在《高丽史节要》“恭让王元年十二月”有相关记载,记录表示从距离首都较远的地方运送瓷器会遭遇诸多困难^{〔2〕},因此朝鲜时期的统治者深刻意识到在首都附近设立窑场的必要性,而考虑到京畿道广州具备了生产和运输王室瓷器的有利条件,于是在世祖末睿宗初年间,即1467年4月至1468年12月间,朝

〔1〕 前揭《贡纳制的解驰》;〔韩〕申奭镐:《概要》,《韩国史·10朝鲜》页1—14,国史编纂委员会,1974年;〔韩〕刘元东:《国家财政》,《韩国史·10朝鲜》页501—515,国史编纂委员会,1974年。

〔2〕 《高丽史节要》卷三四“恭让王一年己巳十二月壬寅”。



廷在京畿道广州设立了分院官窑。

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外，京畿道广州分院得以烧制最上品白瓷的另一重要环境因素是该地有优质白土，虽然分院也曾使用从其他地方运来的白土，但广州当地的白土品质也十分优越，此外，广州地区也拥有大量木柴，这些都是广州成为瓷器产地的有利条件。而与分院官窑白土的准备、柴场的管理、分院的运营、砂器工匠的数量和作用等相关的内容在《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经国大典》和《新增东国与地胜览》等文献资料中均有所记载。通过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掌握朝鲜官窑、王室瓷器和宫廷瓷器的相关内容。

此外，成倪的《佣斋丛话》中提道“世宗朝御器专用白瓷”^①，由此可见，从世宗年间开始，朝鲜王室就喜爱白瓷，王室专用白瓷的数量也因此而逐渐增多，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世祖末睿宗初，司饔院分院在京畿道广州成立，并负责大量生产制作包括王室瓷器在内的宫廷瓷器贡品。

分院是司饔院的的下级单位，接受司饔院的监督和管理，直到朝鲜末期1883年瓷窑民营化以前，分院都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官窑管理机构。司饔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御膳，他们不但要负责准备食物，还要负责制作盛装食物的各种器具，因此，宫廷和中央官府所需的白瓷就由司饔院监督分院制作，因此人们也称之为“分院官窑”，之后朝鲜王朝的窑业则变为分院官窑中心体制，而地方的许多窑则与中央官窑相对应，称为“地方窑”，主要为地方官府或一般阶层供应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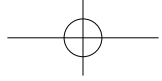
二 瓷器所和陶器所

（一）瓷器所和陶器所的分布与产品特征

《世宗实录·地理志》中介绍了139个瓷器所185个陶器所，对朝鲜时期地方所产瓷器的制作地点和数量进行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如果将这些瓷器所和陶器所按道(即省份)进行分类，那么京畿道有14个瓷器所和20个陶器所，忠清道有23个瓷器所和38个陶器所，庆尚道有37个瓷器所和34个陶器所，全罗道则有31个瓷器所和39个陶器所，另外江原道有4个瓷器所和10个陶器所，黄海道有12个瓷器所和17个陶器所，平安道有13个瓷器所和12个陶器所，咸镜道有1个瓷器所和15个陶器所。据此可以看出，江原道和北部的黄海道、平安道以及咸镜道的瓷器生产和制作较其他地区落后，主要原因有：一，土壤贫瘠，土质不适合做胎土；二，气候和水质等方面的因素导致这些地区不适合建窑；三，这些地区地形险峻，制作出的陶器不方便运输到外地。实际上，高丽时期，瓷器等各地区特产品的运输主要经由海路，主要利用的海路为忠清道和全罗道的西海岸^②。但由于高丽末期倭寇的频繁入侵，西海岸地区的瓷窑被迫关闭，窑址迁往内陆地区，朝鲜王朝的瓷器制作变为主要在

① 成倪：《佣斋丛话》卷一〇，《大东野乘》卷二，国典国译丛书49，民族文化推广委员会，1982年。

② 一直到现在，西海岸海域都打捞出许多高丽青瓷和各种刻有铭文的木筒。（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泰安马岛1号船》，2010年；《泰安马岛海域勘察报告书》，2011年；《泰安马岛2号船》，2011年。



山间瓷窑进行，因此，朝鲜时期，瓷器的运输方式也与高丽时期不同，变为主要利用陆路，这也使得全国各地瓷器所和陶器所都在将优质瓷器运往宫廷一事上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朝廷决定将分院官窑建在距离汉阳较近的京畿道广州，宫廷瓷器的运输也较前有了明显进步。

前面我们介绍到，朝鲜初期瓷器所和陶器所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有忠清道、全罗道和庆尚道，这三个道的瓷器制作较为集中，例如京畿道就有14个瓷器所和20个陶器所，京畿道内的广州一个地方就有4个瓷器所和3个陶器所，瓷窑数量达到7个之多，这7个瓷窑中，属于“上品瓷器所”的只有伐乙川里（现在的樊川里），除此之外的其他6个瓷窑均为下品瓷器所和中下品陶器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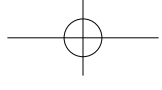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而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庆尚道的瓷器所和陶器所中有3个属于上品瓷器所，尚州中牟县北部的楸县里和东部的己未隈里各分布有一个，另一个则位于高灵县东部的曳岬里。朝鲜时期，庆尚道的瓷器所达到37个，这里所拥有的窑场数量居首，而且当时全国一共4个上品瓷器所中就有3处位于庆尚道，由此可见，当时庆尚道制作了相当数量的王室白瓷，而在下一章我们将会介绍与庆尚道上品瓷器所白瓷相关的文献记录。

那么，《世宗实录·地理志》的瓷器所和陶器所主要制作何等品质的瓷器呢？这些窑场又是如何运营的呢？《地理志》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将瓷器所和陶器所划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的呢？为了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笔者曾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7年之间对各地方窑场展开了详细调查，调查发现，即便是制作精美白瓷的窑址也会出土粗糙的下品白瓷，而且这种情况十分多见，有的白瓷窑址周边甚至还出土粉青砂器，根据这些出土资料我们可以推测，即便一个地区只有一个窑场，也会同时有许多基窑，其中有一个窑专门负责烧制上品白瓷，周围的其他窑则负责烧制粉青砂器，同时也有一个窑同时烧制精美白瓷和粉青砂器的可能，即，即便是同一个窑，也有可能即生产上品白瓷，又烧制中品白瓷、下品白瓷或是粉青砂器。

我们对窑址出土品资料进行分析后可以得知，瓷器所和陶器所均有烧制粉青砂器和白瓷。但是，在窑址挖掘或地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在一些没有被录入瓷器所和陶器所的窑场也能找到标记着中央官府铭的瓷器片，我们推断该窑场可能是属于司饗监督，负责制作瓷器后进贡到宫里^①。综合这些出土资料，我们可以得知，在朝鲜王朝前期的窑场中，有许多窑场是没有被列入《世宗实录·地理志》瓷器所和陶器所的目录当中的。

瓷器所和陶器所出土的瓷器种类繁多，品质不一，那么他们的等级划分标准又是什么呢？就目前的资料来看，我们还很难下结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地理志》所介绍的京畿道伐乙川里、庆尚道尚州楸县里和己未隈里、高灵县曳岬里这四个窑场均生产十分优质的白瓷，因为在窑址调查中发现这些窑场大量生产精美白瓷，同时文献资料也记录这四个窑场负责制作上品白瓷。而上品瓷器所生产最上品白瓷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我们关注的。

① 对于没有被列入瓷器所和陶器所得窑场，笔者暂称其为“其他窑”。[韩]金英媛：《朝鲜时期的瓷器》，首尔大学出版部，2003年。



另外，如果将瓷器所和陶器所与“贡纳瓷器”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全国大部分瓷器所和陶器所都参与贡纳瓷器的制作，上品瓷器所负责大量生产，中下品瓷器所和陶器所则负责少量生产。另外，在出土了粗糙瓷器的大部分窑址中，还可以看到刻有中央官府铭文的瓷片，我们推断这些官府铭瓷器很可能是王室专用或中央官府专用的瓷器，由这些窑址少量生产。

（二）瓷器所和陶器所的王室瓷器

朝鲜初期，贡纳到宫廷和中央官府的瓷器有白瓷和粉青砂器，王室专用的瓷器主要为白瓷。世宗年间只有王才可以使用白瓷，其白瓷的品质可与中国明朝御用白瓷相媲美，品质优越，器形精美。

朝鲜瓷器精美，其名声也传到了中国的朝廷，这点我们可从明洪熙帝往朝鲜派使臣时要求使臣带回白瓷的做法看出，因此，世宗向京畿道广州牧使传旨，要求用心烧制白瓷，详情可见《世宗实录》世宗七年(1425)中的有关记载^①，此外，在世宗年间的记录中还有几处资料表明，广州窑址曾根据明朝使臣提出的要求来烧制白瓷，朝鲜王室接待使臣时也使用广州窑场制作的白瓷^②。《世宗实录》载世宗十一年(1429年)一月，“金满求鍮簪、鍮盘。鍮汤罐各一，瓷器大小并一百二十，瓷酒器六油厚纸数十张，帛布一匹，命与之”^③。

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洪熙帝要求朝鲜进贡白瓷时，世宗没有命令其他地方制作，而是直接下令给广州牧使，因此可以推断，当时的京畿道广州瓷器所能够烧制出十分精美的白瓷，距离首都汉阳较近，当朝廷急需特别烧制进贡给明朝的白瓷时，广州窑场能够马上烧制出并运送到宫里，如果进一步推断，笔者认为进贡给明朝的白瓷是在广州的上品瓷器所烧制的。

而除了《朝鲜王朝正史》、《朝鲜王朝实录》的记录外，在一些个人的文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上品瓷器所制作出精美的最上品白瓷的内容，例如宗直的《彝尊录·金淑滋行状》就有记载，其中写道，世宗二十四年(1442)后的六年间，时任高灵县监的金淑滋(1389—1456)向高灵砂器匠人传授“九节之法”，最终得以制作出精美的砂器，而后，高灵纳贡的白瓷比广州、南原的更加优秀^④。从该记录可以看出，在金淑滋就任于高灵的1442—1447年间，高灵制作出比广州和南原更加优质的白瓷并进贡，该记录还记录了当时非常有名的都巡察使金宗瑞于世宗二十七年(1445年)访问高灵县时的相关内容，金宗瑞指着桌上的白砂器，一再称赞其精美^⑤，由此可见，金宗瑞对高灵白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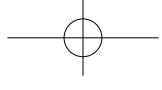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① 《世宗实录》卷二七“世宗七十六年二月乙卯”；成俔：《佣斋丛话》；前揭《朝鲜时期的瓷器》页228—229，首尔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世宗实录》卷二一“世宗五年八月丙子”；卷二五“世宗六年八月庚申”；卷二七“世宗七年二月乙卯”；卷四四“世宗十一年六月乙酉”。

③ 《世宗实录》卷四三“世宗十一年一月五日壬子”。

④ 《世宗实录·地理志》“南原都护府”；金宗直：《彝尊录下》“先公事业·第四”。

⑤ 前揭《彝尊录》下。



器赞不绝口，是因为其比当时的广州白瓷还要精美。

而综合以上与广州和高灵白瓷相关的文献记录，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地方所制作的白瓷都是当时最高级的上品白瓷，而且广州和高灵都被列为《世宗实录·地理志》的上品瓷器所，这些上品瓷器所将瓷器用作纳贡，可见最高级的上品白瓷成为王室的专用瓷器。

朝鲜王朝初期的王室瓷器主要通过两种渠道获得。正式的渠道为将瓷器以实物税的方式纳贡，贡纳瓷器又分为常贡和别贡，定期进贡给王室的方式为常贡，而特别下令制作后进贡则称为别贡。而主动献给宫里的方式就称为进贡，进贡瓷器的方式是不定时的，也有很强的随意性，全国各地瓷器所和陶器所都将贡纳瓷器作为租税缴纳给中央政府和宫廷。因此，世宗年间税制改革后，瓷器的生产量大幅增加，瓷器也成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

那么进贡给宫廷和中央政府的瓷器中，品质最优越的王室瓷器又是怎样的呢？在朝鲜王朝初期瓷器所和陶器所的生产体制中，粉青砂器和白瓷都曾作为王室瓷器使用，因此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在贡纳瓷器的例子中，朝鲜初期粉青砂器的例子有“恭安府”铭粉青砂器钵(1417—1420)以及世宗大王之女贞昭公主(1412—1424)墓出土的粉青象嵌草花纹四耳壶与粉青印花菊纹四耳壶，恭安府是定宗退位后1400年至驾崩的1420年间设立的照顾其生活的官府机构，因此，粉青砂器在宫廷里也是上王使用的瓷器，但该粉青砂器制作于象嵌青瓷发展到象嵌粉青和印花粉青的过渡时期，样式粗糙。相比之下，贞昭公主墓出土的一对壶就可以看到朝鲜初期象嵌粉青和印花粉青的沉稳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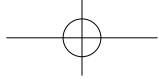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恭安府”铭粉青钵主要是负责照顾上王生活的机构使用，但其胎釉杂质多，胎质疏松〔图一〕，釉泛绿，属于青瓷釉系列，可以说是粉青砂器发展前的样式。除了这件“恭安府”铭粉青砂器外，其他许多粉青砂器中都有与王室相关的官府机构的铭文，尤其是印花粉青，铭文的种类有“恭安府”、“仁宁府”、“敬承府”、“德宁府”和“仁寿府”等，而在粉青砂器上标记官府名的做法源于太宗十七年(1417)，为了防止瓷器的丢失或破损，便于管理，户曹向王上书建议在砂器上标记铭文^{〔1〕}。

而后来，促使粉青砂器的样式从初期的粗糙慢慢发展到较为精美的契机是因为要提高瓷器的品质，世宗三年(1421)，君王下令将工匠的名字写在瓷器上，标记工匠名是为了确保粉青砂器品质而制定的一种责任制，后来，在印花粉青的巅峰时期即世祖年间(1455—1468年在位)集中制作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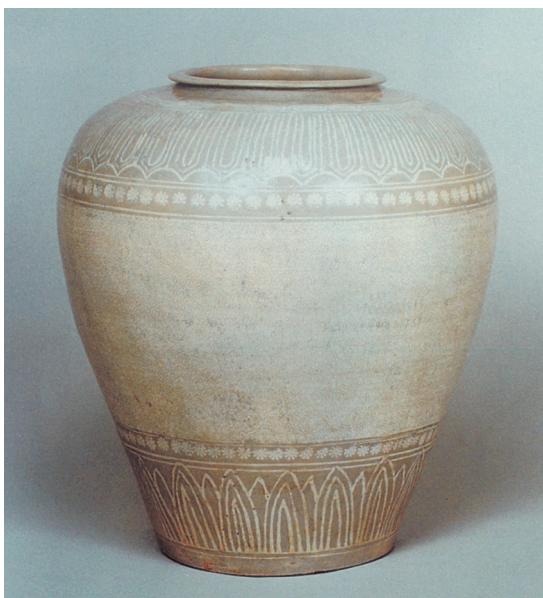
〔图一〕“恭安”铭粉青象嵌莲唐草纹钵(1417—1420年左右)
口径17厘米 湖林博物馆



〔1〕 《太宗实录》卷三三“太宗十七年四月丙子”。



〔图二〕“太一殿”铭白瓷象嵌草纹杯（15世纪前期）
杯高5.4厘米 碟子口径 16厘米



〔图三〕粉青印花菊文月山君胎罐（1462年左右）
高35.7cm(大阪市立东洋美术馆),引自伊藤郁太郎、肥塚良三外:《李朝陶磁500年の美》,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1987年)的插图 2

了许多标记工匠名的粉青砂器。

在现存的文物中，据有确切铭文能够反映朝鲜初期宫廷专用白瓷样式的器物并不多，因此“太一殿”铭象嵌白瓷碟与白瓷象嵌草纹杯便具有重要的价值〔图二〕。该象嵌白瓷碟与杯是宫廷内殿阁专用的，但其属于软质白瓷，样式也比较粗糙，可能是太祖四年(1395)修建景福宫并设立太一殿后，确切地说是在太宗十七年下令将官府铭标记到瓷器上之后制作的。另外，广州窑场烧制出精美白瓷进贡给洪熙帝之事发生于世宗七年(1425)，而该“太一殿”铭白瓷胎质疏松，样式也较为粗糙，因此可推断其制作时间应该为世宗七年之前，即“太一殿”铭白瓷的制作年代为1417年至15世纪20年代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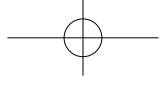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而这样的象嵌白瓷片在京畿道广州牛山里、樊川里、道马里、武甲里等地的窑址也有出土，均为硬质白瓷，与软质“太一殿”铭象嵌白瓷碟、杯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朝鲜初期的软质白瓷在后来逐渐消失，慢慢地被硬质白瓷所取代。而伴随着软质白瓷的衰退和硬质白瓷的增加，到了世宗七年左右，宫廷和中央官府所用白瓷大部分都属于硬质白瓷。

上文我们主要对王室、宫廷和中央政府专用的带铭瓷器进行了分析探讨。由此得知，世宗年间实行标记工匠名制度后，瓷器样式得以发展，到了15世纪40年代，瓷器的样式较以前更为精美。而经历了文宗(1450—1452年在位)和端宗(1452—1455年在位)年间的动荡局势之后，到了世祖年间，粉青砂器的发展便到了巅峰时期，代表性的王室专用粉青砂器有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粉青砂器印花菊文胎罐〔图三〕，该罐制作时间约为1462年，为成宗之兄月山大君之物，也是贡纳给王室的贡品。这个粉青砂器胎罐是15世纪60年代十分精美的印花粉青砂器，而与之相同的粉青素烧片出土于光州忠孝洞，由此我们可推测月山大君的粉青胎罐很有可能是在忠孝洞制作的^{〔1〕}，该粉青砂器胎罐代表了粉青砂器的巅峰，之后粉青砂器就走向衰落。

到了世祖年间，除了宫廷之外，社会上的富裕阶层也开始使用可媲美王室瓷器的高级白瓷，也就是说，白瓷的使用逐渐变得十分普遍，但朝廷还是下令规定白瓷必须为王室专用，文献当中也有关于限制白瓷使用的记录。世祖十二年(1466)四月，君王下令白瓷只能作为贡品，严禁私用。另

到了世祖年间，除了宫廷之外，社会上的富裕阶层也开始使用可媲美王室瓷器的高级白瓷，也就是说，白瓷的使用逐渐变得十分普遍，但朝廷还是下令规定白瓷必须为王室专用，文献当中也有关于限制白瓷使用的记录。世祖十二年(1466)四月，君王下令白瓷只能作为贡品，严禁私用。另

〔1〕〔韩〕郑良谟、金英媛：《光州忠孝洞窑址》，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1992年。



外，京外工匠私自烧制白瓷，并将之销售给朝官庶人之家的行为也被定为违法行为¹。该记录中“庶人之家”等与《经国大典》“刑典禁制”条中“庶人男女”的意思相同²。即除了王室和官府以外，一般的人是不能使用白瓷的。之所以有这些文献记录，从侧面也证明了当时白瓷的使用人群已经扩大到一般百姓。

此外，世祖年间宫廷内使用青花白瓷这一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世祖元年(1455)闰六月，王下御命，命令中宫厨房不再使用金杯，而改为使用“画瓷器”，“画瓷器”即为青花白瓷³。宫廷内青花白瓷使用范围的扩大，也佐证了成俔《佣斋丛话》中世祖年间“杂用彩瓷”的说法⁴，但成俔认为，青花颜料回回青难以获得，因此，在朝鲜初期世宗年间之前，青花白瓷的制作是有相当大难度的。所以在世祖以前，几乎没有关于制作青花白瓷的相关资料，只有《世宗实录》“五礼仪”图说中的陶瓷器资料，以及藏于韩国三星美术馆Leeum的青花白瓷山罍。而世宗和文宗年间的王室专用青花白瓷大部分是由明朝引进的。

朝鲜王朝开始努力制作青花白瓷是在世祖年间，青花白瓷的原料回回青也由全罗道康津和庆尚道密阳等地进贡，同时也有记载表明全罗道顺天用回回青来烧制画砂器⁵，还有资料记载庆尚道蔚山向朝廷进贡青色颜料⁶。以上也说明当时很难从中国购入青料，这在《佣斋丛话》中也可以得到确认⁷。而对《佣斋丛话》中与瓷器相关的内容进行整理，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较为重要的信息⁸。

1. 司饔院官吏带领画吏到窑场，从春季到秋季一直监督瓷器的制作和纳贡。
2. 世宗年间的专用御器为白瓷，到了世祖时期也使用彩瓷。
3. 朝鲜从中国购入回回青，并制作出同样的青花白瓷樽、罍、杯等器物。
4. 回回青在中国极为稀少和珍贵，极难购入，而回回青在朝鲜也同样稀少，因此当时朝鲜王朝青花白瓷的产量极少。

这其中的第3点提到，世祖年间，朝鲜从中国进口回回青，用这些青料做出了与中国青花白瓷一样的瓷器，这一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说明当时朝鲜制作的青花白瓷可能达到了与中国瓷器相近的水准，这点可以从京畿道广州牛山里9号出土的青花白瓷片得到证明，下文将会提及，

〈1〉 《世祖实录》卷三八“世祖十二年四月戊午”。

〈2〉 《经国大典》“刑典禁制条”。

〈3〉 《世祖实录》卷一“世祖元年闰六月癸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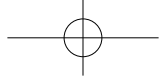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4〉 前揭《佣斋丛话》。

〈5〉 《世祖实录》卷三〇“世祖九年五月壬子”；卷三一“世祖九年闰七月庚申”；《世祖实录》卷三四“世祖十年八月戊子”；卷三四“世祖十年九月癸亥”。

〈6〉 《世祖实录》卷三四“世祖十年九月癸亥”。

〈7〉 前揭《佣斋丛话》。

〈8〉 前揭《朝鲜时期的瓷器》页237—239；《朝鲜前期陶瓷史》，一潮阁，2011年。



兹不赘述。

三 分院官窑

（一）分院官窑的分布与产品的特点

分院设立于1467年4月到1468年12月之间，而分院官窑的运营也在朝鲜前期开始正式步入轨道，前文中我们已经对朝鲜时期陶瓷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这里的前期是指1468—1592年^{〔1〕}。

分院官窑址出土了许多重要文物，其中包括带铭文的白瓷等^{〔2〕}。通过这些铭文白瓷出土品，我们可以了解朝鲜王室和中央政府以及官僚等统治阶层所使用白瓷的种类和品质等。例如广州牛山里窑址出土了官僚和两班阶级所使用的白瓷，通过这点我们就可以确定，朝鲜前期分院官窑白瓷使用人群不仅限于王室，而是已经扩大到官僚或两班等阶层^{〔3〕}。

分院官窑址主要分布于汉江两岸，准确地说是以广州一带的庆安川昆池岩川为中心，分布于河流两岸，《佣斋丛话》记载：“每岁遣司饗院官分左右边，各率画吏，从春至秋，监造而轮纳于御府……”^{〔4〕}，“左右两边”指的就是窑场分布于汉江两岸，因此笔者推断，官窑址出土瓷器上所标记的“左”、“右”铭文，指的就是该瓷器制作地为汉江左岸或是右岸的窑场。

目前，笔者调查过的广州窑址一共有299个，其中分布于面和邑的重要窑址，南终面有29个，退村面有76个，实村面有56个，都尺面29个，草月面57个，中部面28个，光州邑24个等^{〔5〕}。而有窑址分布的各地区有南终面的归坎里、金沙里、分院里、三成里等；退村面的牛山里、道马里、陶水里、元堂里、观音里、亭支里等；实村面的柳寺里、新岱里、五香里、昆池岩里、悦美里、建业里、长深里等；刀尺面（即现在的都尺面）的祥林里、宫坪里、柳井里、楸谷里等；初月面的武甲里、鹤东里、双东里、大双岭里、酸梨里、池月里、仙东里等；中部面的樊川里、梧田里等，此外广州邑有松亭里、炭阁里、木岷里、长芝里等。

这其中文献资料中可寻的地名有五阳洞（现在的五香里）、伐乙川里（现在的樊川里）、塔立洞（现在的池月里）等。从窑址分布时间来看，15—16世纪的窑址分布在樊川里、牛山里、道马里等地，17—18世纪的窑址分布在祥林里、仙东里、松亭里、金沙里等地，1752年分院迁址到分院里，一直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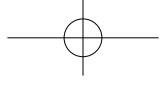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1〕 [韩]金英媛：《以分院设置为中心而展开的朝鲜前期陶瓷研究》，学研文化社，1995年；前揭《朝鲜时期的瓷器》；前揭《朝鲜前期陶瓷史》。

〔2〕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京畿道博物馆：《京畿道光州中央官窑》，1998—2000年。

〔3〕 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朝鲜白瓷窑址发掘调查报告（附广州牛山里9号窑址发掘调查报告）》，《梨花女子大学校博物馆特别展图录21》，1993年。

〔4〕 前揭《佣斋丛话》卷一〇。

〔5〕 这些地名为1998—2003年调查时的资料，可能与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有些出入。



1883年分院变为民营，分院在分院里的历史约有130余年。

官窑瓷器的特征之一就是刻有“天地玄黄”、“左右”、“干支”、“干支+左”“干支+右”等铭文，带这些铭文的瓷器在其他窑址几乎看不到，但在官窑址却有大量出土，“天地玄黄”铭在牛山里、道马里、樊川里、梧田里等地出土〔图四〕，“左、右”铭在武甲里、观音里、亭支里出土，“干支+左、右”铭则在炭阁里、上林里、仙东里、松亭里等地被发现。另外，上林里、仙东里、松亭里窑址还发现了“干支+左 右+数字”或是“干支+数字”等铭文，根据这些铭文，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窑场的运营时间，此外，王室专用最上品瓷器主要产于道马里1号、牛山里 9号、樊川里9号、武甲里11号和归坎里11号等窑址。

至于各窑址出土品的特点，樊川里、牛山里、道马里等窑址为15—16世纪初期和前期的白瓷窑址，主要出土硬质白瓷，还有少量的软质白瓷片，瓷器的种类有纯白瓷、象嵌白瓷，以及少量青花白瓷和青瓷等，器形有钵、碗、碟、瓶、壶等，这些窑址产品上刻“天”、“地”、“玄”、“黄”字样是为了要将其纳给宫里。观音里和亭支里等白瓷窑址除了出土无任何纹样的纯白瓷外，还有铁画白瓷(也称为“铁绘白瓷”)片，铁画白瓷铭文的内容也有所变化，不再出现“天”、“地”、“玄”、“黄”，而是变成“左”、“右”字，而“天”、“地”、“玄”、“黄”、“左”、“右”等字主要是用线刻方式刻在纯白瓷钵和碟子外底部。

朝鲜中期(1592—1751)的代表性窑场分别为炭阁里(1606—1612)、上林里(1629—1640)、金沙里(1721—1751)和仙东里(1640—1649)，这些窑址出土有碟、瓶、壶等纯白瓷，还有铁画白瓷和青花白瓷，以及灰白色、淡青色白瓷，其中有少量青花白瓷碗内部中央刻有“祭”字铭文，铁画白瓷主要刻有龙、竹子、兰草、葡萄和梅花等图案，在仙东里还发现了刻有“申巳”、“壬午”、“左壬午”等1640年至1649年这10年间的干支铭的白瓷残片，据此我们可以推断1640年至1649年间分院官窑窑场存在于此地，该时期白瓷的样式也可以得到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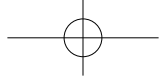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后来，分院官窑从仙东里迁到松亭里，与仙东里窑场相同的是，松亭里窑场也有白瓷片出土，也是在底座内部用线刻方式刻“辛卯”、“癸巳”等干支铭和“左”、“右”铭，以及“己丑”、“庚寅”等铭文，不仅如此，还有以17世纪独特的草花纹和有文字装饰的铁画白瓷，以及饰以简洁草纹的青花白瓷等出土。

在经历了松亭里和五香里时期后，分院官窑于1721年开始设立在金沙里，英祖二十八年(1752)官窑由金沙里迁移到南终面分院里，金沙里窑场生产出了典型的朝鲜中期白瓷，金沙里窑址生产的白瓷白如细雪，器形有瓶、壶等，同时还发现有青花白瓷，上面饰有“祭”、“福”等字或七宝纹、竹纹等，样式简洁。

朝鲜后期(1752—1883)的分院官窑在经历了金沙里时期后，于英祖二十七年(1752)迁移到广

〔图四〕“地”铭白瓷片
鹤东里窑址 (15世纪后期-16世纪)出土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五〕白瓷青花云龙纹壶片(1474年左右),
牛山里9号窑址(1466年—16世纪前期)出土
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



州郡南终面分院里，一直到1883年官窑民营化以前，分院官窑一直设于此地，而在分院窑址出土品中，不仅有与金沙里白瓷特征相似的优质白瓷，也有品质略为粗糙的白瓷，同时，与金沙里窑场一样，这里也出土了一些厚底祭器，祭器内部中间用青花颜料绘有“祭”、“寿”、“福”等铭文，但相比以前，铭文和白瓷品质多少显得粗糙。

（二）分院官窑的王室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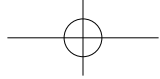
前文提及，分院瓷器主要是进贡给宫廷和中央官府的瓷器，但实际上，除了进贡外，白瓷用作他处的例子并不少见，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给分院官窑的支援不足，于是分院只能私下接受订单，生产白瓷销售，而国家对此也是持默许态度。分院官窑在设立后不久就遇到了困难，他们意识到不能只生产王室瓷器，而官僚或富裕的庶民阶级十分喜爱中国瓷器，也常常偷偷使用分院白瓷，随着白瓷使用人群的扩大，分院白瓷的样式也不仅限于王室要求的样式，而是慢慢开始反映出其他消费者的喜好和需求。

分院官窑正式开始制作白瓷是在朝鲜前期(1468—1592)，该时期的白瓷主要反映了王室的威严，窑址出土品特征与《世宗实录》“五礼仪”(1454)或《国朝五礼仪》(1474)中所载图相对应，例如牛山里9号窑址出土的青花白瓷云龙文壶片〔图五〕，从器形到云纹、龙纹、如意珠纹、十字形云纹等都与这两本书《五礼》中“青花白瓷壶残酒海”的图是一样的，从青花白瓷云龙纹残壶片样式来看，我们可以确定牛山里9号窑址为官窑。

牛山里9号窑址除了出土青花白瓷云龙纹残壶片外，还有“司果”铭青花白瓷墓志残片与“壬寅”铭白瓷阴刻墓志残片等出土^{〔1〕}，“司果”是世祖十二年(1466)将军制度改革为五卫时设置的正六品武官职位，因此可以推算该瓷片制作的时间上限为1466年。而“壬寅”铭阴刻白瓷墓志残片当中的壬寅年为1482年或1542年，因此，结合窑址的新建、修补、改建等因素，我们可以推算牛山里9号窑的运营时间约为1466年至1482年。所以，牛山里9号出土品青花白瓷云龙纹残壶片与《世宗实录》“五礼仪”或《国朝五礼仪》中收录的“青花白瓷酒海”属于同样样式的瓷器，制作时间大约为分院设置后的1467年4月至1482年之间。

而除了窑址出土品外，朝鲜前期的代表性王室瓷器还有藏于东国大学博物馆的“弘治二年”铭青花白瓷松竹纹瓶(1489)〔图六〕，该瓶的釉胎、纹样、器形等都十分精美，尤其是器表所绘的松树具有南宋马夏画派的风格，树枝也弯曲虬劲，松叶稠密茂盛，而向四周延伸的竹子则使用了钩勒法描

〔1〕 前揭《广州牛山里9号窑址发掘调查报告》页13—22。



绘，地面与空间感都得到了良好的表达，整体上看，纹样的绘画手法真实生动，可以确定其为王室典礼中使用的青花白瓷器。

《新增东国輿地胜览》“京畿道广州牧土产”条中有“瓷器，每岁遣司饗院官率画员监造御用之器”的记录^{〔1〕}，从该记录来看，牛山里9号窑址所出土的青花白瓷云龙纹壶与“弘治二年”铭青花白瓷松竹纹壶都是出自国家派遣画员之手的代表性王室瓷器。

在朝鲜陶瓷史的中期发生了壬辰倭乱(1592—1593)和丁酉再乱(1597—1598)，由于战乱，窑场的运营和白瓷的制作受到了严重影响，分院官窑的运营变得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在这一时期，白瓷发展进入了停滞期。

朝鲜中期倭乱结束后，广州炭阙里窑(1606—1612)开始烧制瓷器，17时期初期过后，朝鲜中期的白瓷中，表现出王室或士大夫审美观的产品逐渐有所增加。例如广州分院17世纪窑址仙东里、松亭里窑场就出土了一些白瓷残片，这些残片能让人联想到一幅美丽的四君子画，画中有竹子、菊花、兰草和梅花，而17世纪的代表性器形为“月形壶”〔图七〕，月形壶并不呈完美的球形，它的一侧有些歪斜，但整体形态朴素而丰满，而这种月形白瓷壶也被选为能充分表现出朝鲜民族之美的器形。

分院所生产的瓷器有纯白瓷、青花白瓷、铁画白瓷、铜画白瓷(也称“辰砂白瓷”)等，铁画白瓷在壬辰倭乱以前十分罕见，但从17世纪开始就大量生产，由于壬辰倭乱的影响，全国各地的窑址遭到破坏，生产青花白瓷所需的颜料钴料十分难寻，于是便使用较为容易获取的铁砂颜料来生产铁画白瓷，铁画白瓷的生产也较为容易，泛紫红色，这种颜色也被称为“石间朱”，壬辰倭乱后到朝鲜末期，铁画白瓷主要为一般庶民所使用，制作于17世纪的白瓷铁画云龙纹壶上的龙身大多是分解的，表现手法独特而诙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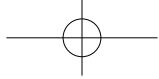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朝鲜时期的瓷器中，红色十分少见，高丽青瓷中饰以红色的也只有铜画白瓷(也称为“辰砂青瓷”)，而朝鲜前期也仅发现铜画白瓷(辰砂白瓷)而已，但从17世纪末18世纪左右起，京畿道广州官窑及周边窑场开始制作带铜画白瓷特点的瓷器，铁画白瓷的抽象纹样在铜画白瓷中变得更加单纯和独特。

〔图六〕“弘治二年”铭白瓷青花松竹纹瓶(1489)
高48.7厘米 国宝 176号 东国大学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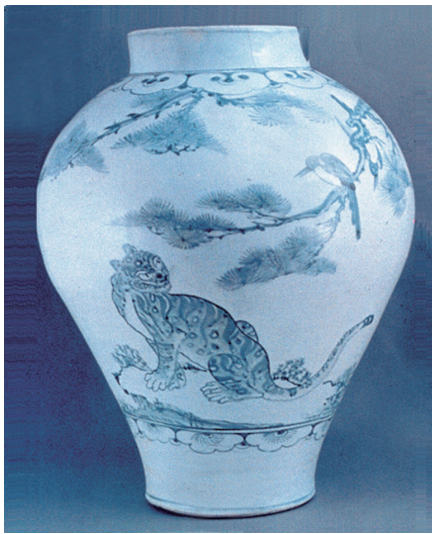


〔图七〕白瓷壶(17世纪后期-18世纪前期)
高 40.8厘米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1〕 《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六“京畿道广州牧土产”。



〔图八〕白瓷青花喜鹊老虎纹壶（18世纪）
高 42厘米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图九〕白瓷青花长生纹碟（19世纪）
口径17.7厘米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水晶朴秉来先生捐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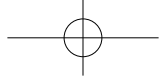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图十〕白瓷青花辰砂彩山形笔洗内部（19世纪）
口径 12.3厘米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朝鲜陶瓷史后期(1752—1883)大量生产砚、笔筒等文房用品和祭器，而随着民画开始流行，瓷器上也开始出现民画、各种图案化的文字以及构图独特的山水鱼纹、凤凰纹、十长生纹、牡丹纹等，并且变得十分流行。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产品为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青花白瓷喜鹊老虎纹壶〔图八〕，该壶口部高，体长，底部削呈斜面，这在官窑立壶中是十分罕见的形式，而松树上的喜鹊与树下的老虎都是民画中常见的主题，在民画中，喜鹊和老虎常用图案化或是诙谐的方式表现出来，而相比之下，青花白瓷壶上的喜鹊和老虎的画法，松树部分所用的树枝法，以及整体构图等都只使用了一般民画的手法，这与民画的手法不同，此外在肩部与底部画了主文样带围绕着如意头文带。

青花白瓷的纹样、构图与器形都逐渐变得多样化，尤其是纹样与构图更是摆脱了先前的样式，朝鲜后期十分流行在圆形碟与四方碟上画折枝纹、山水鱼纹、长生纹、莲池鱼纹、莲花鱼鸟纹、芭蕉纹和蝙蝠纹等〔图九〕，而这些青花白瓷的使用逐渐普遍化，不再限于特定阶层，而是从王室到庶民都能使用，该时期的王室代表性瓷器有白青花辰砂彩山形笔洗〔图十〕，内底面用青料绘四爪龙，威武生动，从施绘龙纹这点来看，可以推测该瓷器为王使用。另外，19世纪开始流行在青花白瓷上加辰砂彩，使瓷器白底泛绿红色，这种华丽的青花白瓷辰砂彩的盛行是这种笔洗被制作的大背景之一。

结论

朝鲜王朝政权建立后，以新兴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势力逐渐崛起，瓷器的需求量大幅增加，王室专用瓷器和与明朝外交时专用的瓷器数量也有所增加，因此，国家积极加大投入以确保瓷器的产量，于是，世宗年间对全国的瓷窑展开调查，编纂了《世宗实录·地理志》，共收录了324个瓷器所和陶器所的位置及其产品的相关情况，由此可见，从朝鲜初期起，瓷器就成为一种重要的贡物，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瓷器所和陶器所将其作为地方土产物贡纳给宫里，贡纳的代表性王室瓷器有粉青砂器和白瓷，其中白瓷尤为珍贵，从朝鲜建国到世宗年间白瓷一直是王专用的御器。



从世祖末年(1467—1468年左右)起,朝鲜开始具备大量生产宫廷白瓷的窑业体制,即设立于京畿道广州的分院官窑,这是专门负责生产宫廷专用瓷器并进贡的窑场,也是全国唯一的官窑,由名为“司饗院”的中央官府直接管理和监督。分院官窑出现后,朝鲜王朝的窑业从初期的瓷器所和陶器所生产体制过渡到前期(1468—1592)的分院官窑体制,直到朝鲜末期(1883),分院官窑变成民营化,而在此之前,分院官窑一直负责向宫里进贡瓷器,其中主要纳贡最上品的王室白瓷。

但是分院官窑所生产的瓷器在宫廷外也有使用,王室会将瓷器下赐给宗亲或官僚,于是王室宗亲和官僚也能使用最上品的瓷器,另外,分院官窑也会通过其他途径将瓷器出售,并为富裕阶层生产瓷器,因此,朝鲜时期白瓷的使用十分普遍,王室所使用的白瓷也给王室的周边阶层和普通百姓带来了影响,受王室的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喜爱使用白瓷,许多地方窑都开始模仿京畿道广州分院生产的宫廷白瓷,因此,粉青砂器开始快速走向衰落,朝鲜王朝迎来了白瓷的时代。白瓷的样式特点会根据使用者身份、时代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色调有雪白、灰白、青白和乳白色等,品质也千差万别,其中王室白瓷是最高身份之人使用的最高级瓷器,尤其是王与王妃的餐具均为最上品瓷器。

纵观整个朝鲜王朝,各时期的王室都十分喜爱白瓷。白瓷强调实用性,造型端正,纯白的白瓷是能充分反映出朝鲜民族追求纯白美感的心理特点,直到今天,生活中常见的钵、碟子、壶、瓶等日常生活瓷器都保留了朝鲜白瓷的基本形态。(冯晶晶译,吴映玟校)

[作者单位: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

(责任编辑:项坤鹏)